

一位先生的远行

忽培元



李前宽，导演，作品有《佩剑将军》《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等。他将镜头聚焦在民族的沧桑与国家的命运上，聚焦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民群众上，这是他每一部影片都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和史诗效果的内在动力所在。

惊悉李前宽先生因病辞世，感到十分突然。多么热情健硕而生命力超常旺盛的一位大导演，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还一直等着先生的电话相约，并且特意准备好了好茶。“培元，回去有空请你到我家喝茶吧，顺便看看《抗美援朝》的拍摄花絮。”

一起喝茶看戏，这是前宽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他富于磁力的东北口音悦耳动人，至今想起还在耳旁萦绕。说这话时，是2020年8月在平谷山一家宾馆院中。当时参事室组织我们参事馆员共同休假，午饭后我们顶着大太阳散步，在院子里遮阳伞下交谈，那是一次彼此都很投入的畅叙。我很喜欢大导演谈他的经历和工作。李先生像年轻人一样单纯而热情，言语之中时有火花绽放，显然老人家也是好久没有如此随心所欲地畅所欲言了。谈起自己的电影创作和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期间的往事，先生眉飞色舞，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老年人特有的倦怠之气全无，发自内心的笑容化作了年轮绽放。我的情绪也被他带动起来，彼此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好多。这就是李前宽导演，一个具有强烈诗人气质的性情中人，这是大艺术家的气质，通达而超脱，既有强烈个性又丝毫不流俗。他开朗而极富表现力的言谈，就像一团炽火，能点燃近前的一切，极具表现力的面部表情更是富于感染力，一下子就把你带入了某种特定意境中，使你情不自禁随着他的喜怒哀乐，变得像个儿童一样天真和痴情。

李前宽导演，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哪怕是初次见面，你也能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一个胸怀坦荡、才华横溢

某位作家在某种报纸上所发表的作品，未必全载于其副刊。如徐志摩有篇《“罗素又来说话了”》就原载上海《时事新报》1923年10月10日第5张第1版“时论”栏，而不在《学灯》《文艺周刊》《文学》《青光》等副刊。近日重新翻阅《时事新报》，又发现徐志摩的一封佚信。这封信写于1930年5月5日，也不是刊登在《学灯》等副刊上。

这封信与上海滩所发生的一起绑票案有关。

1930年4月14日上午8时许，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的两个儿子遭人绑架。是日晨，兄弟俩自驾汽车，从公共租界慕尔鸣路（今茂名路）升平街（鸿远里）十号寓所前往光华大学，同车者尚有其堂嫂张杏晚。汽车行至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中法制药厂附近，被五六名假充测量员的绑匪阻拦。绑匪以手枪将张家三人逼上一辆灰色皮尔大汽车，沿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直驶。途中，推下张杏晚，转身朝东疾驰而去。张家闻讯，立即报案，并设法营救。

4月15日，多家报纸刊登了这一新闻。4月16日，上海《时事新报》第3张第2版所刊发的《张寿镛两子被绑》，其记载更为详细。在这则新闻中，有一段文字涉及徐志摩：

徐志摩君，亦因担任光华大学文学教授一席，昨晨继于颜两教授之后，驾六六七三号汽车赴校，风驰电掣。驶至大西路乡下总会略西之地，突被此假充测量之五六巨匪迎面拦阻。徐因车前有人，遂戛然将车停止。若辈乃向车内一瞥，仍各走散，让出路线。徐当时颇为惊异，见无恶意表

的艺术家的人格魅力。你能想象得出，他给演员说戏时的生动情形。那个山风轻拂的秋日，我们在京郊山中一见如故。整整一个上午的散步交谈还不尽兴，午餐后漫长的午间继续交流，先生讲述他的艺术观点和创作故事，那么天真有趣令人难忘。他谈电影，谈文学，谈绘画，谈音乐……谈到电影《重庆谈判》的主题歌创作，先生竟情不自禁地轻声唱了起来。我这才知道影片中那首穿透人心的插曲，竟然就是他本人创作和演唱的。他说当时在延安拍戏，

原先写好的主题歌大家都不满意。一天，他突然产生灵感，大胆选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调子，并亲自填词试唱。设定的情节是当毛主席乘坐的飞机从头顶飞过，山崩岭上拢羊肚肚手中的拦羊老汉对着茫茫群山引吭高歌，深情凄婉，震惊群山。歌声一下把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深情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说着，又打着节拍完整地唱了一遍。我听得心中热流涌起，禁不住热泪盈眶。就在那一刻，李导完全变成了一个痴情的儿童，脸上的丰富表情要多可爱有多可爱。

我同李导结识时间不长，但神交已久。看懂了他执导的电影，就读懂了先生的艺胆文心。中国电影，开天辟地的现实主义革命历史题材大片、具有史诗风采的佳片力作，他堪称是开拓者，他的创作成就人所共知。和许多观众一样，我也是先看了大量作品而后结识先生的。在接连的几次深谈中得知，先生原本学习的并不是导演专业，而是电影美术专业。1964年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美术创作，但他天赋极高，又特别喜欢导演艺术，格外留心学习导演创作，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导演生涯。1981年起，他先后与夫人肖桂云合作完成《佩剑将军》《开国大典》《决战之后》《重庆谈判》《七七事变》等一系列在中国新时期电影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旋律佳作。《开国大典》获得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重庆谈判》获“华表杯”政府优秀影片奖和百花奖优秀影片奖。他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逐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他的作品继承《史记》写人为主的文

学传统，同时注重体现出永恒的、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意识，塑造出大量发人深省的老一辈革命家和普通革命者形象，也有当代新人群体。他作品的与众不同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充分体现。在他的作品中，领袖与群众，个体与群体，高峰与高原，情节与细节的关系，总是处理得恰如其分、相得益彰，真实真切地还原了历史、复活了历史，气势恢宏又气韵生动。那种史诗风采和贯穿始终的真实力量，更为难能可贵。他针对电影界不时出现的某些歪风邪气，多次旗帜鲜明指出，“电影不是用来卖钱更不是用来牟利的”“电影艺术家应以作品体现社会价值和功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镜头聚焦在民族的沧桑与国家的命运上，聚焦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民这一永恒主题上”。他是这样讲，更注重身体力行，这也是他每一部影片都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和史诗效果的内在动力所在。每一次创作，无论是大制作还是小制作，他都竭尽全力，力图将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将故事讲得精彩生动。哪怕是凡人小事，也要争得亮光，力求使之成为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上的一波一浪。

从这个意义上讲，前宽先生不仅仅是优秀导演，更是具有全局观念和国家意识的电影人。他一直关注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据业内人士回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建立和中国电影博物馆的产生均是他建言献策的结果。2010年国务院九号文件《关于繁荣发展中国电影产业的十项措施》也有他的努力心血。寿终歌未竟，圈点有家珍。李前宽导演的不幸辞世，无疑是文艺界、更是电影界的一大损失。

新发现徐志摩佚信一通

陈建军

现，亦未暇与之计较，立即开车前去，事后始悟若辈向车内一瞥，并非无因也。

事实上，绑票案发生时，徐志摩根本不在现场。当时，他除了在光华大学任教外，还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兼任英文副教授，每周往返于上海与南京之间。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他在光华大学上课，星期一的下午或晚上到南京，星期四返回上海。张家两个儿子被绑走的那天正好是星期一，上午8点，他尚未起床，10点左右才坐公共汽车赴外滩办事。看到新闻中的这段文字，他开始并不在意，只觉得“可乐”。后来，有光华大学的同学告诉他，张家车前确实有一辆车，是一个学生的。于是，徐志摩就想写信更正，但因故没有写成。再后来，有人说将来或许会根据报上新闻传他出庭作证，有的还说张家的亲属怪他既然看见了却连个电话也不打，太冷心了。为了使自己免受不白之冤，徐志摩最终还是写了一封更正信，发表在《时事新报》1930年5月8日第3张第2版“致《时事新报》函”栏，题名《没有那一回事》（当是编辑添加的）。全文如下（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

主笔先生：

我希望借重贵报的通信栏，更正前两个星期贵报所载“张寿镛子被绑”那段

新闻涉及我的几句话。那段新闻（我所见的祇此，但有人说《大陆报》及《新闻报》均有同样记载）里说，那天早上八时（星期一），我也坐车到光华大学去，我的车在张家车的前面，充作测量员的绑票先生们，先拦住我的车，并看不是他们所要的。承他们见弃，绳下留情，被我过去，但后面车里张家的票位少爷他们却没有放过。这是那段消息说到我的大概。我的名姓，甚至我的车的牌号，都不错。更详尽的传言，甚至说我是在车里看书，被放过后，我还回头看来，所以张先生们的被绑是我多少目睹的。

我真是有些受宠而惊了。事实是简直压根儿甘（干）脆没有那一回事。我星期一是在上海不错，但我在光华的功课是星期四五六三天，星期一是我一星期中惟一闲散无事的一天，下午或晚上我照例去南京。我从来不曾星期一到光华去过。我信那一个出事的星期一我也明明记得，早上八点钟时我还深深的在黑甜乡里留恋，难得有一天可以睡迟一点。我约摸到十时左右才出门，碰巧我车夫上天病了没有来，我也不曾去叫他。我到外滩有事，坐了公共汽车下去的。但不知怎的，中西各报的访事先生们偏要赏先派我那早上在光华道上参预到意外的机

密。我到星期四回上海时，不好了，见面的人十有九个都慰问我的虚惊，连我的车夫也受了不少他的同志们的虚惊的慰问。我觉得消息胡缠的可乐，也不在意。后来光华的同学告诉我张家车的前面确是有一辆车，但是一个学生的，不是我的。当时本想，就写信更正，后来不知怎样一搁也就搁下了。到最近我听到了许多话，使我觉得这封信还是不躲搁的好，因为有人说你若是不更正，将来万一破案时公堂上许要根据日报传你做见证，但没有见的如何能证？另一朋友说，张家的亲属在怪我不管事，说既然眼见了怎的电话也不打一个，太冷心的。我都不打算来受这些不白的冤枉，所以我现在还得写这信去请求赏给我一个刊入通信栏的机会，省得一切可能发生的误会。尚此敬颂

撰安

徐志摩上

五月五日

《时事新报》以“珍贵之篇幅”设“致《时事新报》函”栏，旨在为“爱读《时事新报》诸君”提供“申述意见或评述事实”的机会（见“致《时事新报》函”栏目按语）。徐志摩把这封信投给“致《时事新报》函”栏，大概因为关于张寿镛两个儿子被绑票的新闻，他是在《时事新报》上看到的，而这则新闻正好又与“致《时事新报》函”栏同在一个版面。

就在徐志摩更正信发表的前一天，即5月7日，张家兄弟用钱物买通看守，竟安然脱险，逃回上海（见《张寿镛两子昨日出绑》，上海《新闻报》1930年5月8日第4张第15版）。